

嶺南文明進程的考古學觀察

卜工

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提要

本文運用考古類型學方法，系統地梳理了嶺南地區新石器時代至戰國以前的考古學資料。從陶器的製法、風格、形態變化等微觀研究入手，提出了嶺南新石器時代考古學遺存的年代分期框架、青銅時代相區別的界說、青銅時代的階段性劃分理念和基本概念。本文首次在學術界提出了嶺南作為獨立文化區的特徵：即石器的長過程、珠江的大傳統、聚落的多形態和地域的三大塊；再討論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格局的幾個特點，即：中西明朗、東部模糊、南北對話、海陸有別；進而指出嶺南文明是一個漸進、較長的歷史過程，其特點是農耕拓展、文明漸進、俗化百越、禮教南疆。這樣的論述既強調了嶺南地區的自身特點，又突出了其與中原文明的聯繫。同時，本文嘗試用考古學文化特徵區別和命名古國的方法，把嶺南考古學資料的研究提升到歷史學研究的層次。

關鍵詞：嶺南地區、考古學文化區、文明、古國

卜工，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廣東省廣州市水蔭橫四路32號演音大樓B座9樓，郵政編碼：510075，電郵：bugong52@yahoo.com.cn。

在中國的版圖上，南嶺山脈宛如有力的臂膀擁抱着面向海洋的廣東和廣西兩地，神奇、富饒的嶺南地區緊緊地依偎在南部中國的懷抱中。自新石器時代以降，蜿蜒多姿的珠江縱橫千里，上下萬年，孕育出燦爛的古代文化，在文明的進程中寫下了光輝的篇章。中國當代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讚譽這裡是「真正的南方」，是探索中國古代與印度支那半島甚至南太平洋地區關係的「一把鑰匙」。¹ 因此，不論從哪個角度考察嶺南文明進程，其意義都不言而喻。

一

嶺南文明進程的研究是個老課題，但從考古學的視角進行考察又是新的嘗試。這是基於兩種情況得出的認識：其一，歷史學從很早就開始了對嶺南先秦小國的考證，例如，縛婁、陽禺、蒼梧等。有的研究明確指出，「秦漢嶺南初立郡縣，多以這些土邦小國為基礎，利用他們的首領為地方長官，尊重他們的風俗習慣」，「使秦漢王朝順利地實現對這些地區的政治統治」²，這些論述至今仍然指導和啟發着人們的研究。古國的形成是嶺南歷史進程中的質變點，是嶺南文明進程的亮點，也是考察嶺南文明進程的重要指標。但是，由於古代文獻對嶺南的記憶相當模糊，能夠利用的文獻也不過《呂氏春秋》、《山海經》、《史記》、《漢書》的片段記載，一些小國出現的年代又多在春秋或漢代，因此，要比較全面、深入地了解嶺南文明進程及其特點當然就不能不依靠考古學提供的資料。其二，嶺南與中原地區相比，考古學研究的基礎相對薄弱，主要表現在：考古學區系類型理論在嶺南尚未得到充分落實，考古學文化編年體系不完善；經科學發掘的大遺址不多，考古工作多局限在單純的野外調查方面；考古資料的整理與考古報告的編寫週期過長，嚴重影響了認識的深化；一些研究滿足現狀，用「砂」、「軟」、「硬」的概念表述考古學遺存年代與特點的研究流行時間過長，描述性、介紹性、綜述性的文章成為研究中的主流，缺乏大局觀和必要的深度，重大課題的綜合性研究尚未提到日程上來；新石器時代與青銅時代、青銅時代與鐵

1 郭大順，〈蘇秉琦先生談「嶺南考古問題」〉，載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深圳市博物館編，《華南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頁1-6。

2 司徒尚紀，《廣東政區體系》（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8），頁23。

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的界定研究不夠，對一些考古學遺存年代的認識似是而非，說不清楚，不能客觀地揭示嶺南考古學文化的特點，難以吸引更多的研究關注嶺南考古。因此，從考古學的角度考察文明進程，必須跳出以往的窠臼，既要立足於嶺南的自身特點，又要着眼於南中國的文化格局和中國古代文明進程的大趨勢，加強理論思維，堅持實事求是，才能把考古資料的研究提升到歷史學研究的層次，認識嶺南考古學文化運動的規律和特點，說明嶺南文明進程的模式和特色。

新石器時代以來，嶺南地區的考古學文化就顯示了鮮明的自身特點，展現出一個獨立考古學文化區所要求的各種特徵，與同時期中國其他考古學文化區域相比可謂獨樹一幟。這些特點本文概括為：「石器的長過程」、「珠江的大傳統」、「聚落的多形態」、「地域的三大塊」。這是嶺南先秦考古學的基礎，捨此便不能正確認識嶺南先秦考古學資料。以往的研究恰恰在這個問題上存在明顯的疏漏。

首先，「石器的長過程」。這是指嶺南地區新石器時代開始的年代早而結束的時間晚，文化積澱的過程長。廣西桂林甌皮岩和廣東英德牛欄洞³的發掘表明，嶺南新石器時代開始於一萬年之前，比中原地區已有的考古學資料都早，顯示出嶺南是探索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或轉變的重要地區。像稻作起源、陶器的產生等都是這裡倍受重視的研究課題。

與嶺南新石器時代早期考古學資料較少的情況不同，晚期的資料相對多些，具備了進一步討論的條件。由於對考古學文化分期研究的不足和對文化界標存在理解上的差異，過去許多被視為嶺南新石器時代晚期的考古學資料其實已經具有青銅時代的特徵了，也就是說嶺南新石器時代終結的年代並不清楚。近來，雖然一些研究者逐漸認識到這一問題的重要性，但由於理論上的困惑，始終未能提出正確的認識，因此，嶺南新石器時代的下限仍然是若明若暗。

以嶺南中部地區而論，新石器時代晚期粵北山地與環珠江口地區已經形成了文化性質完全不同的考古學區域。北有著名的石峽文化⁴，南有香港湧

3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工作隊、桂林甌皮岩遺址博物館、桂林市文物工作隊，《桂林甌皮岩》（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英德市博物館、中山大學人類學系、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英德史前考古報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

4 廣東省博物館、曲江縣文化局石峽發掘小組，〈廣東曲江石峽墓葬發掘簡報〉，《文物》，1978年，第7期，頁1-15。

浪⁵、東莞圓洲⁶、珠海寶鏡灣⁷等遺址代表的遺存。前者以鼎、三足盤為特徵，後者以釜、小口繩紋圈足罐、豆為特徵。粵東地區的小口繩紋圈足罐形態與環珠江口地區的比較接近，反映出這個時期這一地區考古學文化的格局主要是南北的問題。可是，當上述遺存消失之後，這些地點卻呈現出另一番文化風貌。特別是粵北山以南的珠江三角洲地區，不同地理單元的考古學遺存在文化面貌上雖有不同的表現形式，但共同的特點已經基本形成：陶器的基本組合發生了變化，小口繩紋圈足罐退出了歷史舞臺，表明文化結構出現變化；紋飾中雷紋的問世，預示着以往流行的刻劃紋將被更規範的拍印或戳印取代；折肩器、折腹器和凹底器，器口內側和領口以下修整的特點反映了製陶工藝邁向更高的臺階；碳十四年代資料顯示這些遺存雖有早晚之分，可基本都在商代紀年之內。這些遺存雖然已經走出了新石器時代，但尚未見青銅製品的出現，它們在陶器的質地、顏色方面與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存比較相似，構成了千絲萬縷的聯繫；可是陶器基本組合與晚商時期的考古學文化遺存更接近，顯示出在文化結構和傳統方面的承襲關係。在考古學文化的研究中，陶器的基本組合指示文化特徵，是某一考古學文化與它文化相區別的主要標誌；陶器的質地、顏色只反映製陶技術，是研究生產力水準的指標之一。可見，在認識嶺南新石器時代晚期的考古學遺存時，要有一個去偽存真的甄別過程，不能人云亦云，應着眼於大的文化背景和時代風格，按考古學研究的基本原則將某些遺存從新石器時代晚期中區別出來，歸回青銅時代，從而使兩者的界標準確明瞭，年代清楚。有的研究者試圖將這類遺存稱為「夏商時期」的遺存，其實這是一個極大的誤區。蘇秉琦先生曾說過嶺南有「自己的夏商周」⁸，那是講嶺南有自己的歷史，不能理解為嶺南考古學文化的年代和階段劃分可以完全與中原地區相對應。因為，嶺南地區相當中原夏紀年時期的新石器時代尚未終結，還不能區別出具有特殊指徵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考古學文化；而文化面貌和結構發生較大變化（主要是陶器基本組

-
- 5 香港古物古蹟辦事處，〈香港湧浪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97年，第6期，頁35-53。
 - 6 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東莞市博物館，〈廣東東莞市圓洲貝丘遺址的發掘〉，《考古》，2000年，第6期，頁11-23。
 - 7 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珠海市博物館，〈珠海寶鏡灣——海島型史前文化遺址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 8 郭大順，〈蘇秉琦先生談「嶺南考古開題」〉，載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深圳市博物館編，《華南考古》，頁1-6。

合方面的變化)是在早商時期,這些考古學遺存的年代不能早到中原地區的夏時期,與夏代無涉,不能生搬硬套。反而江西清江流域商代吳城文化對嶺南地區影響的線索更為清楚⁹,是識別新石器時代終結和認識嶺南早期青銅時代特點的依據。廣東珠海後沙灣¹⁰、南海魷魚崗¹¹、香港湧浪等遺址的碳十四年代資料顯示,嶺南新石器時代的下限約在距今3500年前後,大體相當於中原地區的早商時期。

這個較中原地區漫長的發展過程是分早中晚三期為妥,還是前後兩期適宜?以往的分期研究,在地域上多是局限在廣東(或其局部或其相鄰地區);在年代上大都從彩陶開始,基本上不包括珠江中游也就是廣西一帶新石器時代早期階段的考古學資料;在年代的下限方面,通常是將青銅時代的遺存與新石器時代晚期資料組織在一起加以論證的,所以新石器時代結束的年代也就自然被淹沒了,年代分期的科學性也因此容易受到質疑。¹² 本文將

9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西樟樹吳城商代遺址第八次發掘簡報〉,《南方文物》,1995年,第1期,頁5-23。

10 珠海市博物館、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廣東省博物館,《珠海考古發現與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

11 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系實習隊、三水市博物館,〈廣東南海市魷魚崗貝丘遺址的發掘〉,《考古》,1997年,第6期,頁65-76。

12 1984年,朱非素提出三期說(朱非素,〈廣東新石器時代考古若干問題的探討〉,載廣東省博物館編,《廣東省博物館建館三十周年論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9〕,頁50-62);1986年,楊式挺也提出三期說(楊式挺,〈廣東新石器時代文化及相關問題的探討〉,載廣東省博物館編,《廣東省博物館建館三十周年論文集》,頁63-84);1991年李子文提出從彩陶到夔紋陶的六期說(李子文,〈珠江口沙丘遺址的考古實踐與認識〉,載《廣東省博物館館刊》(第2輯)〔廣州:廣東省博物館館刊編輯部,1991〕,頁121-128);1993年鄒興華提出從彩陶到青銅器出現的五期說(鄒興華,〈珠江三角洲史前文化分期〉,載鄒興華編,《嶺南古越族文化論文集》〔香港:香港市政局,1993〕,頁40-55);1995年曾騏提出了他的看法(曾騏,〈環珠江兩側的史前文化〉,載《東南亞考古論文集》〔香港: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1995〕,頁285-294);1997年簡志禛、毛永天對香港新石器時代的分期也提出認識(簡志禛、毛永天,〈香港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分期及與珠江三角洲地帶的關係〉,《考古學報》,1997年,第3期,頁255-284);1999年卜工將這裡彩陶代表的遺存歸為新石器時代晚期,同時,提出在嶺南考古學文化分期研究中運用了「年代組」的概念(卜工,〈環珠江口新石器時代晚期考古學遺存的編年與譜系〉,《文物》,1999年,第11期,頁48-56);2000年古運泉、李岩、李子文不用三期說,而用早晚二期的概念表述考古學資料(古運泉、李岩、李子文,〈廣東考古世紀回顧〉,《考古》,2000年,第6期,頁1-10)。

嶺南作為一個獨立的考古學文化區，將已知新石器時代和商時期的考古學資料綜合比較，剔除部份過去未曾認識的屬於早商時期的考古學遺存，提出嶺南新石器時代「三段式」年代分期框架：

第一階段，距今10000年以前。此階段現在積累的考古學資料不多，但涉及的問題很重要，是陶器產生的階段，需要等待時日才能作深入探索。

第二階段距今10000至6000年左右，主要發現集中在珠江中游附近。考古學文化的特點是以長方體敞口深腹圓底夾砂陶罐作為主要炊器，缺少水器和盛食器，流行細繩紋和陶器口沿外側施繩紋領口的風格。

第三階段距今6000年左右到3500年前後，長方體的敞口深腹圓底夾砂陶罐演變為方體的卷沿鼓腹形陶釜，再發展到扁方體折沿鼓肩形陶釜。這個階段的較早時期流行彩陶和刻劃紋兩套不同系統但均有特色的紋飾，器類中多見圈足盤、碗、陶支腳，不見水器，等等。這樣的劃分有實際內容和陶器特徵的支撐，有助於理解嶺南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特點和傳承發展的態勢，對考察嶺南文明進程尤為重要。

其次，「珠江的大傳統」。嶺南地區新石器時代因河流、地貌的不同構成了諸多不同地理單元，但考古學文化遺存在這些不同的地點卻有很多共性：基本的陶器組合相同，都是深腹罐、圓底釜、圈足盤碗和陶支角，在陶器類別中缺乏水器和盛食器的特點反映了飲食結構和傳統與中原地區差別很大；陶器的基本要素相近，如器類形態相似、紋飾以繩紋為主、刻劃紋發達而且獨具特點、陶器的製法無大的差別¹³，這說明物質文化運動的節奏較慢，更新的頻率過緩；石器中石斧、石鏟、石球、研磨器、石拍較多，加工裝飾品比較流行，似乎有獨特的石器生產加工體系，這表明嶺南地區有一個大珠江的文化傳統，與中原地區黃河、長江流域有顯著區別。如，黃河中游與下游地區分別有半坡文化、廟底溝文化、後崗一期文化、北辛文化等；長江中游有彭頭山文化—石門皂市下層文化—湯家崗文化的系統，與下游地區的馬家浜文化—松澤文化—良渚文化系統相呼應；其間還有安徽凌家灘文化—薛家崗文化系統的存在，這同在一條河流的不同考古學文化，其面貌與特徵截

13 資料表明，珠江中下游地區的炊器具有一脈相承的淵源關係，珠江下游的陶釜是由中游地區的深腹罐發展而來，變化軌跡十分清楚，口部的特點是由侈口直領向敞口卷沿、再到折沿的方向發展；腹部是由弧腹向鼓腹、再到鼓肩的方向發展，整體形狀是由長方體向方體再到扁方體發展，最大橫經由小於通高而逐漸接近進而超過之；紋飾特點是繩紋領口、劃紋切割繩紋領口、領口外側加工圖案，如三角形紋填充紋飾，再到素面。

然不同，文化淵源與傳統迥然有別，一望便知譜系不同，差別所在。可見，嶺南地區的考古學文化具有相對獨立和穩定發展的特點，文明進程因此也具有自己的特徵。

再次，「聚落的多形態」。嶺南地區新石器時代的遺址具有多樣性的特徵。洞穴、沙丘、貝丘、崗地遺址是嶺南先民的主要生活地點，與中原地區多見經營農業的村落遺址有較大差異。洞穴和沙丘遺址面積都不大，反映着當時的聚落規模和特點。可能是因為嶺南溫度適宜，植被茂盛，自然資源充足，適合於小規模的族群生活。其中，沙丘遺址集中在沿海一帶，遺址中網墜多見，如珠海寶鏡灣遺址在500平方米的發掘範圍內就出土了一千多件網墜，其經濟生活與漁撈有關是顯而易見的；洞穴遺址多見於桂林北部，考古發現的動物骨骼說明其經濟生活主要與狩獵和採集相聯繫，只是這兩類遺址的居民長期固守一地的可能性不大。學術界曾對沙丘遺址是否為季節性的營地有過討論，但無論如何，經營沙丘和洞穴的人們都不如以農耕經濟為主體的貝丘和崗地遺址的人們那樣經年累月的長久駐守，所以，遺跡現象少，堆積相對較薄。換言之，古代的嶺南地區有多種經濟形態存在，與當時植被和地理的狀況相適應。「農業是整個古代世界的決定性的生產部門」¹⁴，嶺南地區典型的以農耕為主要經濟生活的遺址數量不多；非農耕的人群是當地文化流動的重要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制約着人口的增長，這是考察嶺南文明進程要充份注意的問題。

最後，「地域的三大塊」。嶺南作為獨立的考古學文化區，依考古學遺存的面貌與特徵又可以細分為東、中、西三塊。東部是蓮花山以東的粵東地區，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存發現不多；西部是肥沃的珠江中游地區，新石器時代早、中期遺存豐富；廣西梧州以東的珠江下游為中部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的資料相對豐富。其中，西部地區相對穩定；東部是珠江與閩南九龍江流域兩個文化中心的過渡地帶，早商時期以後兩種以上的文化因素犬牙交錯，因時消長，屬嶺南的外圍顯而易見，本文姑且將其作為嶺南地區的一部份；中部則隨着時代的變化逐漸開放、活躍，成為演繹嶺南文明進程的大舞臺。

總之，「石器的長過程」揭示的是嶺南新石器時代率先起步，同時又具

14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載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4卷，頁145。

有發展上的滯後性；「珠江的大傳統」反映的是文化上的特殊性；「聚落的多形態」表明的是經濟形態的多樣性；「地域的三大塊」說明的是嶺南地區的考古學研究也存有區系類型的問題。

二

嶺南古國的探索是考察嶺南文明進程的重要內容。在中國考古學研究中，但凡提到古城古國，人們自然會想到中原地區新石器時代的「仰韶」概念。因為當年蘇秉琦先生基於紅山文化的重大發現，首次將古國形成和出現的年代提早到仰韶時期¹⁵；後來的研究者又在古國到秦帝國之間增加了方國和邦國等概念，形成了中國古代國家由古國、方國、邦國到帝國的發展序列。龍山時期山西襄汾陶寺遺址¹⁶是方國存在的有力物證，商周時期周邊地區的封國與中央王朝有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的密切聯繫，治理土著，獨霸一方，始終在臣服與獨立的搖擺過程中生存，而文化上則以多種因素混合生長為特點。中原古國興起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嶺南則不同，古國的形成不是在新石器時代而是在青銅時代。因此，必須了解嶺南青銅時代的階段劃分，才可能認識並鎖定其興起的具體年代。

1. 嶺南青銅時代的分期

嶺南青銅時代考古資料的發現與相關研究發端很早。1932年英人芬戴禮在香港仔神學院附近海邊的沙灘中發現青銅器殘片¹⁷，爾後在南丫島發現匕首等青銅器與夔紋硬陶器共存，最早提出了「青銅器文化」的概念。此後，隨著時間的推移和考古資料的迅速積累，綜合研究也提到日程上來。其中，對年代與分期的探討較多但意見有分歧，主要有「三期說」、「二期說」和「現行分期不可行說」等。¹⁸「三期說」使用肇始期、形成期、繁榮期的概

15 蘇秉琦，〈遼西的古文化古城古國——兼談當前田野考古的重點和大課題〉，《文物》，1986年，第8期，頁41-44。

16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隊、臨汾地區文化局，〈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發掘簡報〉，《考古》，1983年，第1期，頁30-42。

17 Daniel J. Finn, *Archaeological Finds on Lamma Island, near Hong Kong* (Hong Kong: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58).

18 何介鈞，〈試論嶺南青銅文化〉，載深圳市博物館編，《深圳考古發現與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頁192-201；徐恒彬，〈廣東青銅時代概論〉，載《廣東

念，認為肇始期始於商代晚期，形成期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中期，繁榮期從春秋至秦統一嶺南。並且認為戰國時期在某些遺址中已出現鐵器，但發現數量少，分佈範圍有限，所出鐵器從類別形式和大小來說都與南嶺以北的楚地完全相同；因此，可推定當時嶺南尚無自己的鐵器冶鑄業，應把秦統一嶺南作為鐵器時代的開端，即青銅時代的終結。「兩期說」有兩種意見，一是認為早期從西周到戰國早期，即夔紋陶類型時期，晚期為戰國中、晚期，是米字紋陶類型時期；二是認為西周至春秋為前期，後期為戰國時期。同時也有認為上述分期均不可行者。

應該指出，上述研究對嶺南青銅時代的認識和理解曾起過歷史性的推動作用。但存在的問題也很明顯，因為當時對青銅時代年代上限估計得過晚，使用的分期概念有大而空之嫌，難以揭示嶺南地區的自身特點。20世紀90年代，嶺南中部地區青銅時代的考古資料有突破性的發現。其中，廣東珠海棠下環¹⁹、東莞村頭²⁰、三水銀州²¹、南海魷魚崗、博羅橫嶺山²²、深圳屋背嶺²³、普寧後山²⁴、香港馬灣島東灣仔北²⁵的考古收穫令人耳目一新。運用過去的認識已經難以詮釋這些嶄新的資料，歷史的認識與現實的資料在此碰撞，不能不使人們反思以往的研究。

過去的「兩期說」由於新資料的登場更顯蒼白無力，基本上已無人採

出土先秦文物》（廣州：廣東省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聯合出版，1984），頁45-86；吳曾德、葉揚，〈論廣東青銅時代三個基本問題〉，載深圳博物館編，《深圳考古發現與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頁202-211。

- 19 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珠海市平沙文化科，〈珠海平沙棠下環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98年，第7期，頁4-16。
- 20 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東莞市博物館，〈東莞村頭遺址第二次發掘簡報〉，《文物》，2000年，第9期，頁25-34。
- 21 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系、三水市博物館，〈廣東三門市銀洲貝丘遺址發掘簡報〉，《考古》，2000年，第6期，頁24-36。
- 22 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博羅橫嶺山——商周時期墓地2000年發掘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
- 23 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深圳博物館、深圳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深圳市南山區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深圳市屋背嶺商時期墓葬群〉，載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深圳市博物館編，《華南考古》，頁163-186。
- 24 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普寧市博物館，〈廣東普寧市池尾後山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98年，第7期，頁1-10。
- 25 香港古物古蹟辦事處、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香港馬灣島東灣仔北史前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99年，第6期，頁1-17。

納。「三期說」肇始、形成、繁榮的概念所表述的三個階段乃是事物發展的一般規律，概念本身並沒有錯誤，但用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概念來概括某一地區的具體情況，缺乏特殊性，不能揭示嶺南青銅時代的主要特色。另一個問題是，嶺南青銅時代的劃分是否一定要以青銅器為依據？上個世紀就有研究者指出：嶺南的青銅器「大都零星出土，缺乏明確的層次關係，何時進入兩廣或何時在兩廣仿造，都存在問題，只依據器物的年代學時間，遽定為兩廣與中原文化的接觸時間，顯然是不合適的……在中國嶺南和西南地區，較晚的墓中保存較早的中原器物是常見的事」。²⁶可見，對嶺南青銅器的年代要有充分的分析，而認識的水準也就有賴於對考古學文化遺存的整體研究了。

迄今為止，嶺南青銅時代的遺址發現很多。據早年的統計，僅廣東地區就有五百餘處²⁷；先秦青銅器的出土地點遍佈嶺南四十多個市縣，總數八百多件²⁸，所見的青銅器年代主要集中在春秋戰國時期。研究表明：此時青銅器中有與中原地區完全相同者，有與滇黔地區發生密切聯繫者，也有來自長江流域的因素。但由於獨具特色的人首柱形器、半球形器屢屢在此地發現，青銅器中含砷的特點亦完全有別於中原地區，加之夔紋陶遺存自身所表現的青銅文化色彩，嶺南青銅時代存在一個土著時期已成爲學術界的共識，而其年代則大約在西周晚期至戰國中、晚期。

1984年，珠海東澳島考古調查採集到與青銅製品相關的石範²⁹，爾後又在珠海棠下環商代遺址發掘到石範，這成爲將嶺南青銅時代的年代上限推至商時期的物證。像廣東東莞村頭、曲江石峽中層等遺存由於許多文化因素與珠海棠下環的遺存相近而被視爲嶺南青銅時代早期的文化類型。但是有兩種情況必須考慮：首先，珠海棠下環這樣的海島遺址是否具有冶銅的資源？冶銅和鑄器是青銅器生產過程的兩個環節，如果沒有冶銅的資源和條件，鑄器

26 黃展嶽，〈論兩廣出土的先秦青銅器〉，《考古學報》，1986年，第4期，頁409-434。

27 楊式挺，〈嶺南先秦青銅文化考辨〉，載中國古代銅鼓研究會編，《中國南方及東南亞地區古代銅鼓和青銅文化第二次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廣西：廣西民族出版社，1993），頁212-220。按：此文中關於廣東「青銅文化遺址（含遺物點）約有500處」的估計，以目前的認識衡量之，未必準確，當時統計的方法和對材料的認識可能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由於無新的統計，暫從之。

28 黃展嶽，〈論兩廣出土的先秦青銅器〉，《考古學報》，1986年，第4期，頁409-434。

29 珠海市博物館、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廣東省博物館，《珠海考古發現與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

的材料必然從外地輸入；其次，發掘面積比珠海棠下環大幾倍的東莞村頭遺址卻毫無青銅製品的線索，由此推斷，海島所見的石範應是舶來品，資料顯示它來自同時期的粵東或其以東的地區。可見，對於嶺南青銅時代的中部地區而言，在土著時期之前還存在一個舶來品的時期，其年代大約在商代晚期至西周中期。廣西武鳴發現的青銅卣、戈³⁰、廣東饒平浮濱遺址採集的青銅戈³¹，也明顯屬於舶來品，年代在商周之際。由此觀之，舶來的管道與器物的種類有必然聯繫，值得關注。

然而，這個舶來的時期是否為嶺南青銅時代的早期卻是問題。因為比珠海棠下環晚商遺址更早些的廣東珠海後沙灣、三水銀洲、南海魷魚崗、普寧後山、廣西鳴武³²、香港馬灣島東灣仔北等遺址中的某些遺存已經與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存形成明顯的區別，如果將他們與青銅時代的考古學遺存聯繫起來考察就不難發現：陶器基本組合的相似表明了文化結構的相同；紋飾中雷紋的出現與以後更加規範的拍印或戳印紋在製法上一脈相承；折肩器、折腹器和凹底器，器口內側和領口以下修整的特點也開後來製陶傳統之先河。如此看來，嶺南青銅時代在舶來時期之前還存在一個未見青銅製品時期，或可稱前青銅製品的時期。碳十四年代資料表明其年代大約在商代早期至商代晚期。

至此，不難得出這樣的認識：嶺南青銅時代可分三個大的階段，早期是未見青銅製品的時期，中期是舶來的青銅製品時期，晚期是土著的青銅製品時期，不同的階段又存在年代劃分的可能。以往人們通常使用分析中原地區青銅時代的概念，或謂濫觴、形成和發展；或謂初始、成熟和繁榮。對嶺南青銅時代進行階段劃分，這種嘗試和概念雖然無可厚非，但終不能揭示青銅時代的特點，只有從材料出發，而非概念出發，才可能得出比較接近客觀實際的認識。中國青銅時代在不同的地區發展不平衡，進程與道路也有區別。學術界大都接受中國青銅文化可能是多源的觀點，也認同不是任何一種考古學文化都可以直接生長出青銅製品。因為青銅器的生產需要資源、技術與經驗等多方面的條件支持，因此一些與中原尚有距離的邊疆地區，即或考古學

30 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廣西壯族自治區考古五十年〉，載文物出版社編，《新中國考古五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頁330-346。

31 廣東省博物館、饒平縣文化局，〈廣東饒平縣古墓發掘簡報〉，載《文物資料叢刊》（第8輯）（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頁100-105。

32 李珍、黃強、韋志貞，〈廣西武鳴發現早期岩洞墓〉，《中國文物報》，2003年8月8日。

文化的結構與新石器時代相比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或飛躍，進入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卻仍然需要等待青銅文明資訊的刺激和技術的傳播，然後才能形成自己的風格。換言之，由紅銅到青銅的過程並非是中國所有地區步入青銅時代的惟一模式。當然，未見青銅製品的青銅時代早期在概念上似乎有些矛盾，但這其實也並不難理解。正如「前陶新石器」或「無陶新石器」對於新石器時代一樣，在某些地區這可能是必然的階段。青銅時代與青銅製品是有聯繫的不同概念，青銅時代的特徵是青銅製品的出現，但在某種情況下也非唯一標準。例如，二里頭遺址中屬於二里頭文化第一期的階段就未發現青銅製品。而相當於此時的其他同類性質的遺址很多亦都不見青銅製品，人們能據此而否認這些遺存已經進入了青銅時代嗎？從中國青銅時代的全局考察，嶺南青銅時代的特點和歷程可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為全面、正確的認識中國青銅時代的文化結構和區域特點，以及不同地區進入青銅時代所走過的道路與模式提供了新的線索。不過，嶺南青銅時代與新石器時代的分野是在早商時期以後，與其他的邊遠地區可能存在差異。

2. 考古學探索嶺南古國的理念與方法

有了對嶺南青銅時代的年代認識，還必須在研究的理念和方法上有所更新和進步，才能對嶺南古國的形成有客觀、正確和更深刻的理解。對夔紋古國的認識有助於說明這個問題。

1999年廣州至惠州高速公路建設時，在博羅縣內的橫嶺山發現一處商周時期的墓地。在8000平方米的發掘範圍內清理出三百餘座墓葬，出土了大量青銅器、夔紋陶器、原始瓷器和石器等，而這個發掘面積僅僅是該墓地的三分之一，更大型的墓葬還在墓地的中部。據此可推斷該墓地約有近千座墓葬，而其年代大約經歷了商代晚期至春秋晚期。這個發現使人們聯想到以往在博羅地區的考古發現。該墓地以西約二十公里處就曾有大批春秋戰國時期的窯址，在附近發現過青銅器窖藏。生活的地點和死者的駐地、人口的規模和出土器物的級別都足以證明這裡有古國的存在，而且，這個古國與後來的南越國當有歷史淵源。《中國歷史地圖集》推定文獻記載的縛婁古國就在博羅境內³³，橫嶺山墓地的發現證實了文獻記載的真實性和研究的預見性。

根據橫嶺山墓地的資料，可以確認這個古國的聚落始於商代晚期，西周中期以後發展壯大。有意義的是該墓地的考古資料非常具有代表性，陶器的

33 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90），頁5。

組合完整，器類齊全，其中比較精彩的是具有標識意義的夔紋，幾乎囊括了以往嶺南地區發現的所有夔紋圖形，而且圖案規範，變化的軌跡相當清楚。這些特點反映出夔紋的裝飾具有某種特殊意義，甚至可能具有禮儀的特徵及旗幟般的標識作用。過去，嶺南的夔紋陶是作為文化類型被人們認識的，集中的發現也在中部地區的東江流域。現在來看，嶺南地區夔紋陶的其他發現地點都缺乏連續性線索，所以，那些夔紋陶由外部輸入或傳遞而來的傾向已經十分明顯，其放射中心就在廣東的博羅地區。

廣東博羅地區的這個古國應該如何命名？是根據文獻稱其為縛婁古國，還是依據地名直呼其為博羅古國？考古學研究與文獻並不矛盾，本文也認同博羅考古資料與文獻的對應關係。但是，如果博羅的資料按文獻的記載名之，那些缺乏文獻記載地點的古國的命名就成問題了，畢竟文獻的記載有限。然則如果用其他方法命名，至少在邏輯上就不統一了。那麼，據地名稱之如何？囿於工作的局限性，目前尚不能斷言博羅地區僅存有這一類遺存；同時，由於對文獻理解的不同，史家的考據往往眾說紛紜，因此，以地名稱之也難免日後引起爭議。

更重要的是考古學有自己的方法，考古學習慣於從文化面貌和具體的特徵上認識、區別和概括研究對象。有鑑於此，本文嘗試用考古學文化特徵表述古國的存在，以描述嶺南地區文明的亮點。如此，廣東博羅橫嶺山等遺存代表的古國可稱為「夔紋古國」。這樣就提供了從考古學遺存的特徵上認識古國的經驗，也就是說，在嶺南的青銅時代特殊的歷史條件下，不同古國的居民文化傳統不同，考古學文化的地域特點與古國的地域性在某種意義上吻合，這個地域特徵既是嶺南古國形成的基礎又是古國出現的標誌，因此，有些地區雖然尚沒有重大的遺跡現象和特別精美的高級別器物發現，也完全可以根據考古學文化的地域性特徵推定古國的形成與否。當然，這只是根據嶺南考古學文化和古國的特殊性而採取的一種特殊表達方法，在嶺南地區目前還未曾發現能出其右的方式，至於這種方式能否適用於中原地區，還有待實踐的檢驗。

還有一個問題顯然也是不能回避的。一處古代遺址或墓地與一個古國是否可以用等式表示，這樣是不是過於牽強？這當然是大遺址與古國的關係問題。在文獻的記載中「黃帝時萬諸侯」，禹時「執玉帛亦有萬國」，夏王朝的後期情況開始變化，《帝王世紀》載：「孔甲之至桀行暴，諸侯相兼，逮湯受命，其能存者三千餘國」，殷商以降到西周，「凡千七百國，又滅湯時千三百矣。」春秋時，「尚有千二百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弑君三十六，

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這些數字準確與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些記載揭示出中國古代由分散到集中，逐步走向統一的大趨勢，符合規律和邏輯，因而基本可信。古國多說明當時的國家小。文獻記載「七十里為政於天下，湯是也」（〈孟子·梁惠王下〉），周人興起也不過百里，所以，筆者曾提出，在更為遙遠的廟底溝二期文化時，像陶寺遺址那樣的古國有三、五十里便可以雄視天下了。³⁴ 這實際上就是強調大遺址與古國核心範圍的對應關係。需要說明，在中原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某一考古學文化可能同時擁有不同的古國，他們或可能各自獨立，或可能有附屬關係；然則，在嶺南地區情況可能恰恰相反，某一考古學文化只能與某一古國相對應，這是嶺南地區非常值得重視的特點。

3. 考古學探索的嶺南古國體系

按上述的認識和經驗，在夔紋古國之外，嶺南地區還有格紋古國、釉陶古國、素面古國、繩紋古國、石矛古國存在。

格紋古國。2003年配合基本建設在廣東曲江矮石的崗頂墓地清理出四十餘座墓葬³⁵，分別屬於西周和春秋兩個時期，陶器的基本組合是罐、豆，有青銅戈發現，陶器的類別不如博羅橫嶺山墓地多，隨葬器物也不豐富，可是，陶器表面的紋飾卻很有特點，這裡流行的不是夔紋而是方格紋，早晚兩期都是如此，清楚地顯示出傳統的根深蒂固。這個墓地現存的規模不大，出土器物的級別不高，應該不是當時的中心地所在。但是，由於這裡墓葬的年代與博羅橫嶺山大致相同，器表的紋飾有對應關係，因此，可以認定有古國存在。歷史文獻學考證陽禹就在粵北至湖南南部一帶，可證上述認識不誤。根據博羅橫嶺山的經驗，這個古國可稱為「格紋古國」。

釉陶古國。1974年在嶺南東部的饒平浮濱遺址發現一種考古學遺存³⁶，以釉陶、石戈最有特色，陶器的基本組合是大口尊、折腹豆、圈足壺，陶器上的刻劃符號引人注目，此類遺存被稱為浮濱類型，並被認為主要分佈在韓江流域。近年來，這類遺存在福建的九龍江流域有更多的重要發現，如漳州的虎林山遺址出土了與浮濱遺址完全相同的陶器，還發現了青銅戈、牙璋等禮

34 卜工，〈關於古文化與古國的思考——四論文明起源的中國模式〉，《中國文物報》，2003年10月24日。

35 據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發掘資料。

36 廣東省博物館、饒平縣文化局，〈廣東饒平縣古墓發掘簡報〉，載《文物資料叢刊》（第8輯），頁100-105。

儀性的高級別器物。³⁷ 陶器的類型學研究表明，漳州的虎林山遺址的圓肩高領罐在形態上早於浮濱等地的折肩高領罐，而且，在以往的考古發現中，嶺南中部和東部地區這類遺存具有東部早於西部的傾向，顯示出其中心聚落原本可能在九龍江而不在韓江流域，隨着時間的推移才逐步向嶺南地區滲透。廣東博羅橫嶺山和深圳屋背嶺、珠海的島嶼以及香港的馬灣島都能見到它的影響，年代為嶺南青銅時代第二階段。這類遺存能夠反映國家形成的重要遺跡現象尚未發現，但物質文化的水準已然越過文明的門檻，所以，可稱其為「釉陶古國」。

繩紋古國。在番禺、東莞、深圳這一帶有較密集的商代遺址分佈，例如，番禺的南沙³⁸，東莞的村頭，深圳的向南村³⁹、屋背嶺都有較大面積的考古發掘和較豐富的文化遺物與遺跡的出土。據華南師範大學曾昭璇教授考證，〈山海經·海外南經〉中有「或曰謹朱國」，驩頭、驩兜、驩朱相通，唯讀音不同。謹朱即番禺之異譯，所以驩兜也為番禺之異稱。⁴⁰ 這個古國是否在肇慶一帶，目前尚無考古學資料的支持，倒是番禺及其以南的商代遺存很可能與這個古國有關，這裡暫稱其為繩紋古國。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時期墓葬出土器物與遺址有明顯區別，不同地點的墓葬文化面貌差別大，而遺址的文化面貌基本相同，表明各地的居民在發展的道路上與外界的聯繫及受到的影響是有差別的。

素面古國。廣西武鳴一帶曾屢有商周時期的青銅器發現，其中馬頭元龍坡西周至春秋的墓地⁴¹ 最典型，這裡流行特殊的埋葬習俗，墓壙挖成船形，個別墓葬有半圓形耳室，還有一種將隨葬器物打破分散埋葬的現象。隨葬器物以陶器為主，組合為釜、罐、碗、杯、壺等；青銅器是卣、盤、矛、匕等，陶器的紋飾除數量很少的變形雲雷紋、繩紋，基本上是以素面為主，顯示出抵制夔紋和格紋的傳統，這裡姑且稱之為「素面古國」。不過，這裡流行西周時期的青銅盤，與廣東博羅地區多見鐘的情況完全不同，說明珠江中

37 福建博物院、漳州市文物管理辦公室、漳州市博物館，《虎林山遺址——福建漳州商周遺址發掘報告之一》（福州：海潮攝影藝術出版社，2003）。

38 據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發掘資料。

39 深圳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深圳市博物館、南山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深圳市向南村遺址的發掘〉，《考古》，1997年，第6期，頁77-86。

40 司徒尚紀，《廣東政區體系》，頁19。

41 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工作隊等，〈廣西武鳴馬頭元龍坡墓葬發掘簡報〉，《文物》，1988年，第12期，頁9-13。

游古國在形成的過程中與中原地區另有聯繫的管道，嶺南的文明進程的情況是比較複雜的問題。

石矛古國。廣東湛江平坦的峰背遺址以大量的磨製石器為特點⁴²，其中石矛最有特色。這種石矛不是新石器時代常見的那種，不尖銳，雙面刃，起脊，有柄，形態在矛與圭之間，這裡姑且稱「矛」，實際用途當不是生產工具，也非武器，而與禮儀活動有關的可能性很大。該遺址的考古工作還有待更深入地進行。有的研究曾根據文獻推測這一帶古國的狀況⁴³，值得重視。頗具特色的典型器物業已暗示出古國的存在和研究的前瞻性，這裡暫稱為「石矛古國」。與其他古國相比，這裡陶器資料的發現和考古工作的緊迫性顯得格外突出。

此外，廣西平樂銀山嶺戰國墓葬⁴⁴與武鳴一帶年代相近的墓葬存有顯著區別，足證古國的傳統不同。那裡西周前後的考古學資料是探索古國的關鍵，還有待進一步的發現。廣東普寧後山遺址以雞型壺為代表的文化遺存也必須給予足夠的重視，其地處夔紋古國和釉陶古國之間，青銅時代的第二階段便已向南北散去，故本文從略。

綜上所述，嶺南地區古國的形成在東中西部有不平衡的傾向，但是，至遲在青銅時代的第二階段已經全面啓動，不同的區域有不同的中心，不同的文化乃至不同的人群有其獨特的標識。然而尚有一批以漁撈和狩獵為生計的人們可能游離於古國之外，繼續過着比較簡陋、原始和古樸的生活。易言之，嶺南文明的初期階段，古國只是幾個據點，她們的周圍是更原始的部族，在這種錯居雜處的環境中，古國的居民不斷推廣自己的生產和生活方式，觀念意識及典章制度，這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過程。另外，古國、方國、邦國這些常見的概念在學術界是用以表述秦帝國之前的國家形態，但是考古學的特徵並不十分清楚，本文使用古國的概念僅僅是用以指示嶺南地區最早出現的國家，在這一點上可能與「古國」的原意相同。嶺南地區從古國

42 據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發掘資料。

43 馬頭發掘組，〈武鳴馬頭墓葬與古代駱越〉，《文物》，1988年，第12期，頁32-36；蔣廷瑜，〈從考古發現探討歷史上的西甌〉，載百越民族研究會編，《百越民族史論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頁217-230；張榮芳，〈西漢時期蒼梧郡文化論述〉，載《秦漢史論集（外三篇）》（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5），頁179-206。

44 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工作隊，〈平樂銀山嶺戰國墓〉，《考古學報》，1978年，第2期，頁211-258。

到帝國是否還存在例如方國和邦國的形態？已知的資料不足為證。特別是戰國時期考古學資料的缺乏，造成嶺南地區已有古國的線索陷於中斷，許多問題又變得撲朔迷離了。

三

考察嶺南文明進程不能脫離南部中國的文化背景，也不能置中國古代文明進程的大趨勢於不顧。考古學探索文明起源不是普通意義或廣義的文明，文明是一種社會的進步，這種廣義的文明，需要多學科的努力才能獲取更豐富的知識，而且，這種社會進步是從古到今的過程，包含着當代的文明。考古學探索的文明是狹義的文明，是關於古代國家形成的過程，是基於「國家是文明社會的高度概括」⁴⁵的認識進行的研究。考古學從物質文化及其運動過程中發現矛盾、尋找邏輯、認識規律、探討社會結構、組織和秩序，揭示古國的特點和文明的特徵。

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是以禮制的成熟與發展為主要特徵的，這是文明起源中國模式的基本內容。⁴⁶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的矛盾運動在古代中國集中體現在禮制方面，禮制是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結晶，禮制是道德觀念，是行為準則，也是維持社會秩序的依據；在血緣關係和家族、宗族傳統濃鬱的古代中國禮制是一種公共權利，在協調、團結、引領和規範更多的社會團體方面發揮作用，正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經典作家指出，國家的兩個基本特徵，一是「按地域來劃分它的國民」，二是「公共權利的設立」，可見，禮制的成熟與發展實為中國古代文明的根基之所在，魂魄之所繫。

已知的資料表明：中國古代的禮制有一個長期發育的過程。至少從新石器時代中期距今約七千多年前的磁山遺址開始禮俗就已經形成相當的規模⁴⁷，爾後連綿不斷，特點鮮明，後來的甲骨文和「三禮」的問世都是這個過程的後續環節，而且文獻記載的禮制諸多內容，如盟誓制度、昭穆制度、用鼎制度、贈賻制度、喪禮、以及禮器的名實都不僅僅停滯在文獻依稀記得的年代，完全可以根據考古學資料上推到新石器時代的晚期，並揭示出古代社會

45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載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頁172。

46 卜工，〈文明起源的中國模式〉，《中國文物報》，2003年2月21日。

47 卜工，〈磁山祭祀遺址及相關問題〉，《文物》，1987年，第11期，頁43-47。

的中國特徵。古代中國在「周禮」之前還有個「古禮」的階段，確定它的形成與否關鍵在於對禮器的認識。當時的禮器是普通生活中使用的陶器，器表施特殊的紋飾。仰韶時期廟底溝文化的彩色陶器便是禮器，其考古學的特徵一是圖案規範，暗含着某種制度的約定；二是變化敏感，顯然是使用頻率高於普通的日用器所至，所以，在通常的情況下這種器物用以判定年代可以，用來劃分類型不行；三是具有特殊的文化穿透力。廟底溝文化的彩陶、大汶口文化的陶鬶都可以穿越重重的文化障礙，到達匪夷所思的遠方。前者以陝晉豫交界處為中心，但其影響在山東泰安、江蘇的邳縣可以見到，向西進入青海，向北到達內蒙，向南則飲馬長江；後者以泰沂地區為中心，但向西的挺進卻可達到西安以西。中國古代的禮器有陶、玉石、青銅等不同的質地，其出現的年代不同，但也有共生的階段，對於探索中國文明起源而言陶質禮器的意義更為重要，而嶺南的資料也提供了最好的注解。

那麼，嶺南的文明進程與文明起源的中國模式有怎樣的關係呢？考古學資料表明：俗化百越、禮教南疆是嶺南文明進程的重要特點。目前的考古學資料已經能夠勾勒出嶺南新石器時代晚期考古學文化的基本格局，概括起來就是：中西明朗，東部模糊，南北對話，海陸有別。即珠江中下游的情況基本清楚；粵東地區新石器時代的考古學文化除了早年陳橋遺址，其他線索不明確；洞穴與沙丘遺址南北相守，中部的石峽文化與香港湧浪遺址代表的遺存南北對峙；環珠江口的島嶼上一種以發達刻劃紋為代表的遺存與大珠江的傳統區別明顯。這個格局是認識嶺南文明特點的基礎，應該得到重視。此外，嶺南地區東中西部的區別是文化交流的活躍程度和相互影響的問題，南北則有經濟形態的問題。

資料表明，大珠江的傳統在嶺南地區維持的時間頗為長久。廣東曲江石峽、封開杏花村⁴⁸和勒竹口⁴⁹、吳川黎屋村梧山嶺⁵⁰等遺址都分別與廣西南寧頂獅山遺址幾個時期的遺存相同，顯示出不論是珠江的下游、粵北山地，還是沿海地區文化面貌的一致性；這種珠江的大傳統不可能直接生長出後來的石峽文化。距今6000年前後，湖南安鄉湯家崗遺址⁵¹的彩陶由湘水走靈渠

48 據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發掘資料。

49 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封開縣博物館，〈廣東封開勒竹口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98年，第7期，頁38-41。

50 據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發掘資料。

51 湖南省博物館，〈湖南安鄉湯家崗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1982年，第4期，頁341-354。

而入西江，然後一路南下，在廣東高要蜆殼洲⁵²、東莞萬福庵⁵³、深圳大黃沙⁵⁴、珠海後沙灣、香港大灣遺址⁵⁵留下了南進的足跡，開始動搖了珠江的大傳統，改變了嶺南地區的文化格局；距今5000年左右江西清江流域樊城堆⁵⁶等遺址以三足盤、鼎代表的遺存與浙江好川墓地⁵⁷以陶鬶、玉琮代表的遺存重組後翻越大庾嶺梅關進入廣東，取大珠江傳統而代之，以石峽文化的嶄新面貌獨立於粵北山地；距今3500年以後，福建九龍江流域以虎林山遺址代表的遺存不斷地由東而西滲透嶺南；在嶺南的西側，岷江流域的考古學文化遺存通過「金沙走廊」翻越雲貴高原，向紅河流域挺進的步伐從來就沒有停止過，越南北部富壽省Xom Ren遺址、永富省Phung Nguyen遺址分別於1981、1985年發現的牙璋與成都廣漢地區商周時期的同類器幾乎完全相同。⁵⁸最近，越南Xom Ren遺址的再發掘又有牙璋收穫⁵⁹，有些樣式見於成都金沙遺址，這些資料足證「金沙走廊」在商周時期依然被充分利用，這或許可以解釋紅水河流域的廣西武鳴馬頭元龍坡西周時期的墓地與廣東博羅橫嶺山墓地顯著區別的原因所在了。以往，一些研究雖然都承認自新石器時代以來嶺南地區就與中原地區特別是與長江中下游地區有文化方面接觸，但傾向於文化通道的「形成發展時間與楚人進逼嶺南大體一致」⁶⁰，估計過於保守。現在看

-
- 52 李子文、李岩，〈廣東高要蜆殼洲發現新石器時代貝丘遺址〉，《考古》，1990年，第6期，頁565-568。
- 53 李岩、李子文，〈廣東東莞市三處貝丘遺址調查〉，《考古》，1991年，第3期，頁193-197。
- 54 文本亨、譚世龍，〈深圳市大黃沙沙丘遺址發掘簡報〉，載深圳市博物館編，《深圳考古發現與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頁17-27。
- 55 鄧聰、黃韻璋，〈大灣文化試論〉，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編，《南中國及鄰近地區古文化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4），頁395-412。
- 56 江西省博物館、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清江縣博物館，〈清江築衛城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76年，第6期，頁383-397；清江博物館，〈江西清江樊城堆遺址試掘〉，載劉慶柱編，《考古學集刊》（第1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頁82-87。
- 57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遂昌縣文物管理委員會，《好川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 58 王永波、張春玲，《齊魯史前文明與三代禮器》（濟南：齊魯書社，2004）。
- 59 卜工，〈考古學文化傳播的路徑與內容——以大石鏞、牙璋、彩陶等為例兼談中國文明的禮制根基〉，《中國文物報》，2004年9月10日。
- 60 黃展嶽，〈論兩廣出土的先秦青銅器〉，《考古學報》，1986年，第4期，頁409-434。

來，秦始皇五十萬大軍進嶺南的路線古來有之，而且，文化走廊遠比人們預計的要多，聯繫更緊密，嶺南地區的考古學文化與中原地區血脈相連，文明起源的中國模式在嶺南繼續延伸是客觀的歷史事實。

在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以及夏商周時期，考古學文化的傳播與流動從來都只是現象，其本質是禮制的推廣，嶺南地區當然也不例外。當彩陶、陶鬶、玉琮等物質文化在嶺南大地上崛起，人們看到了一種嶄新的要素在遊弋、滌蕩和拓展，這個要素就是禮制。禮教南疆的帷幕由此拉開，隨着時間的推移它逐步獲得了對嶺南地區的統治。湘系的彩陶原本就與廟底溝文化的直接影響有關，禮器的功能與生俱來，它們在嶺南中部地區的出現可視為中原禮制衝擊嶺南的第一次浪潮。陶鬶是禮器，鄒衡先生考證是文獻所稱的「雞彝」⁶¹，玉琮也是禮器，源自良渚文化，它們在粵北石峽遺址的登場是禮制衝擊嶺南的第二次浪潮。第三次浪潮是商代，江西清江流域的商代遺存⁶²對嶺南的影響促進了中部地區文化結構和特徵的變化。廣東東莞村頭、香港大灣遺址出土的牙璋在中原地區習見，它們在嶺南的發現，足證禮制具有跨越文化障礙的極強文化穿透力。此後，在廣東博羅地區包括橫嶺山墓地可以見到濃郁的周禮特點，「鐘鳴鼎食」取代了「觥籌交錯」，已是當時人們尊崇的時尚。到南越國時期，南越王墓葬中漢代的制度已然成為主流。

嶺南文明進程中文化發展的不平衡性和經濟形態的多樣性值得注意。考古學資料顯示，率先邁入文明門檻的是以農耕經濟為主體從事多種經濟活動的人們，那些單純從事漁撈和狩獵的人們雖然能夠接受禮制的薰陶，但很難繼續傳承、發揚光大，彩陶在廣東珠海後沙灣、中山龍穴⁶³、澳門黑沙⁶⁴等地的影響及消失就是明證。所以，有些研究認為越人在嶺南建立了許多小國，可考古學能夠認識的古國數量並不多，這些古國與中原的文明又有千絲萬縷的聯繫；而嶺南大部份地區的人們仍然在黎明的前夜中奮鬥、摸索；易言之，嶺南地區並非是越人的一統天下，文獻記述的一些小國既是中原文明的同化者，又是文明的傳播者，歷史沒有忘記她們的貢獻；同時，俗化百越，禮教南疆是一個相對較長的歷史過程。

61 鄒衡，《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62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西樟樹吳城商代遺址第八次發掘簡報〉，《南方文物》，1995年，第1期，頁5-23。

63 中山市博物館編，《中山歷史文物圖集》（香港：香港大公报，1991）。

64 鄧聰、鄭煒明，《澳門黑沙》（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6）。

至此，可以得出兩個基本的認識：第一，嶺南文明是在中原文明的開發、開化的影響下逐步形成的，因此，屬於次生文明，而不是原生文明。由於她不是從當地文化內部自然生長出來的，因而，在其發展過程的每個階段始終都能見到中原的影子。這就造就了嶺南文明的階段性清楚，連續性不太明顯的特點，在嶺南地區，沒有一支考古學文化或一個古國能將文明進行到底，這與中原地區完全相同。文明是此起彼伏的過程，禮制在傳承中得到發展，只有在中國文明進程的大格局中才能認識和說明嶺南地區的文明歷程。所以，文明起源的「滿天星斗」⁶⁵說，客觀、形象地揭示出中國古代文明的多源性和接力式發展的形式特點；文明起源的中國模式不僅能夠釋讀中原地區的考古學資料，對於認識邊疆地區也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嶺南提供了新的資料和經驗。第二，文化的積累和社會的進步達到了需要禮制維繫、管理和引領的階段，是嶺南吸收中原禮制的內部條件，即內部的動力。這是以農耕為基本生產方式的人們特殊的需求。中國古代的文明說到底是農耕社會的文明，禮制的基礎是農業的生產方式。一個古國、一個文明的亮點所覆蓋和照耀的地區是很有限的，農耕在嶺南的推廣是漸進的過程。考古學資料表明：南越國時期不要說徐聞至湛江的雷州半島仍為土著佔據，就是粵北山地與廣州、番禺也有較大區別。西漢設郡之後，漢文化的禮儀制度、生產和生活方式才得到比較全面的推廣，至南朝時期迎來了嶺南地區經濟和文化的更大發展。因此，嶺南文明進程是文化、制度、經濟等方面的綜合性研究課題，需要更多的學科共同關注和努力，才能使我們的認識更接近歷史的真實。

本文對嶺南文明進程的認識就是三句話：第一、先秦時期嶺南考古學文化的區域特點包括：石器的長過程，珠江的大傳統，聚落的多形態，地域的三大塊；第二、嶺南新石器時代晚期的考古學文化的基本格局可歸納為：中西明朗，東部模糊，南北對話，海陸有別；第三、嶺南文明進程的主要特色可總括為：農耕拓展，文明漸進，俗化百越、禮教南疆。

（責任編輯：劉焱鴻）

65 蘇秉琦，〈遼西的古文化古城古國——兼談當前田野考古的重點和大課題〉，《文物》，1986年，第8期，頁41-44。

Archaeological Observa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Lingnan Culture

Gong BU
Guangdong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the methodology of archaeological typology to interpret the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of the Lingnan region from the neolithic to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rough analysis of pottery production methods, styles, and forms, the author proposes new interpretations of the chronology of Lingnan in the neolithic; the demarcation between the neolithic and bronze ages, and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bronze age. The article identifies Lingnan as a distinctive cultural area, based on its protracted period of stone tool use, the long-lived traditions of the Pearl River region, its multi-form settlement patterns, and the existence of three sub-traditions. In the late neolithic, the Lingnan area demonstrated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distinctive culture in east and centre regions; less distinctive culture in the west; cultural dialogue between north and south, and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coast and inland regions. The emergence of Lingnan culture was a gradual, long-term historical process involving the diffusion of agriculture,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diffusion of rituals and customs. The paper also uses the archaeological method of distinguishing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in order to identify ancient

Gong BU,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of Guangdong, 9th Floor, B Block, Yanyin Building, Shuiyin Heng Si Road, Guangzhou, Guangdong Province, 510075, P. R. China.
E-mail: bugong52@yahoo.com.cn.

states that are known historically, and thus raises the research into the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of Lingnan to the level of historical research.

Keywords: Lingnan area, archaeological culture area, civilization, ancient state